

百家爭鳴，走向深入

——第25屆國際舊約研究大會（柏林）觀察*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and the Need for Expansion: Observations from the 25th Congress of IOSOT (Berlin)

燕昭宇 姜振帥

YAN Zhaoyu JIANG Zhenshuai

作者簡介

燕昭宇，蘇黎世大學神學與宗教學系博士研究生。

姜振帥，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YAN Zhaoyu, Ph.D student, Faculty of Theology and Religion, University of Zurich.

Email: zhaoyu.yan@uzh.ch

JIANG Zhenshuai,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Judaic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Email: jzsjiangzs@163.com

Abstract

This report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25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IOSOT), held at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in August 2025. Gathering nearly 500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congress demonstrated both the breadth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Old Testament studies and related fields. The report highlights Bernd Schipper's keynote address on Egyptology and the Hebrew Bible, offers an overview of the sessions' papers presented at this congress, and discusses trends in the study of textual materi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and epigraphical findings in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mong other topics. The authors also reflect on the limited but growing participation of Asian scholars and advocate for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that draws upon China's rich textual culture and exegetical traditions to enrich global biblical scholarship. The paper situates the IOSOT congress as a reflection of ongoing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and calls for increased Sino-biblical engagement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s:IOSOT 2025; Old Testament/Hebrew Bible studies; Ancient Judaism; Sino-biblical studies

2025年8月11至15日，第25屆國際舊約研究組織大會（25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tudies of the Old Testament，下簡稱“大會”）在柏林洪堡大學召開。來自全球數十個國家的近500位舊約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盛會，在五天的會程期間共宣讀了378篇論文，均創下近年歷屆之最。按照慣例，五個附屬“兄弟組織”的大會也與本次大會同期召開，分別是：國際瑪索拉研究學會（IOMS）、七十子研究學會（IOSCS）、庫姆蘭研究學會（IOQS）、武加大研究學會（IOVS），以及在本屆最新成立的敘利亞語學會（ISLP）。這次大會上，中國學者姜振帥（山東大學）、燕昭宇（蘇黎世大學）分別在分會場發表了論文；陳湛（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浸會聯合國際學院）則在敘利亞語學會會場進行了發言。

國際舊約研究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ies of the Old Testament，IOSOT）於1950年在荷蘭萊頓成立。^①當時，由於德國教會、大學以及一批有影響力的神學學者與納粹的合作，德語學界在聖經研究領域長期以來的主導地位受到了嚴重影響。為了在戰後“重整旗鼓”，在幾位荷蘭學者的倡議下，來自歐洲各國的50餘位學者齊聚萊頓，決定成立一個真正具有國際性、跨語言，並致力於深刻反思納粹及反猶主義影響的新學會，IOSOT應運而生。同時，他們還做出了兩項決定：（1）每三年在不同的大學舉辦一次大會^②；（2）創辦一份新的期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本次大會主席施珀爾（Bernd Schipper）教授的支持，並蒙他及大會秘書伯姆（Jonathan Jakob Böhm）先生提供了部分有關信息，謹致謝忱！

^① 關於IOSOT和VT雜誌的歷史，見：Rufolf Smend, “Fifty Ye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Vetus Testamentum.” *Vetus Testamentum* 50, no. 1 (2000): 14-26.

^② 在萊頓會議之後，歷屆的舉辦地分別是：哥本哈根（1953），斯特拉斯堡（1956），牛津（1959），波恩（1962），日內瓦（1965），羅馬（1968），烏普薩拉（1971），愛丁堡（1974），哥廷根（1977），維也納（1980），薩拉曼卡（1983），耶路撒冷（1986），魯汶（1989），巴黎（1992），劍橋（1995），奧

刊《舊約》雜誌 (*Vetus Testamentum*, VT)，以取代因上述原因而聲望受損的德語期刊《舊約科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ZAW)。^①如今75年過去了，《舊約》雜誌已成為該領域的三大頂級期刊之一，其“增刊叢書”(VTSup)也成為本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書系品牌之一。此外，鑒於IOSOT大會每三年方召開一次，也被廣泛認為是舊約學界最重要的國際活動。

本次大會的開幕式在柏林歷史悠久的“紅市政廳”(Rotes Rathaus)舉行，作為大會主席的柏林洪堡大學“古代東方世界中的古以色列史”講席教授伯德·施珀爾(Bernd Schipper)發表了題為《埃及世俗體紙草文書與希伯來聖經：邁向關於埃及與聖經的新範式》的主旨演講。施珀爾本人擁有聖經研究與埃及學兩個博士學位，一向致力於“把埃及重新帶回聖經研究”的工作：兩個學科在現代興起之處曾經有過緊密的關係，早期學者就已經注意到了一些埃及新王國文獻與聖經文本，如《阿吞大讚歌》(*Great Hymn to Aten*)與《詩篇》104篇之間的平行對應，或是將約瑟、出埃及與以色列人的起源聯繫於埃及歷史上的“喜克索斯入侵”，或在摩西和古猶太教的源頭同第18王朝的“埃赫那吞宗教改革”之間進行大膽的聯想，等等。但自19世紀末亞述學的勃興以來，學者的注意力幾乎完全被引向了美索不達米亞的方向；而埃及由於在聖經誕生的公元前第一千紀霸權不復，淪為國際舞台上的“二流玩家”，反而彷彿對聖經文獻和古猶太教的形成沒有發生多少實質性影響。施珀爾的報告直截了當：現在到了該糾

斯陸(1998)，巴塞爾(2001)，萊頓(2004)，盧布爾雅那(2007)，赫爾辛基(2010)，慕尼黑(2013)，斯泰倫博斯(2016)，阿伯丁(2019)，蘇黎世(2022)，柏林(2025)，下屆亦已預定於2028年在羅馬舉行。其中，盧布爾雅那(2007)是第一次在原東方集團國家舉行，而南非斯泰倫博斯(2016)則是首次在非洲及全球南方舉行。據了解，近年來，學會力求更進一步強化其國際屬性，着意在非傳統西歐地區，特別是新興的亞太地區辦會。

^① 但後者並未就此被前者徹底取代，而是亦重整旗鼓，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學術聲望。如今，兩者加上美國的《聖經文學雜誌》(*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JBL)構成了舊約研究領域的三大頂級期刊。

正這種偏頗的時候了！他和他的團隊通過對一千紀後期埃及世俗體（Demotic）文獻的整理研究，發現了大量此前未被注意到或未引起足夠重視的文學平行，特別是在聖經智慧文學、先知—啟示文學的領域。這對思考波斯-希臘化時代猶太社群的形成頗有重大意義，象島文獻（Elephantine）以及聖經的內證均表明，當時除了被擄—歸回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社群（“東部流散”）以外，還應當廣泛存在於埃及的散居社群（“西部流散”），儘管我們對於他們後來是否以及如何歸回耶胡德地區所知不詳，但新的文學證據的發現，或許能夠提出一種頗有想像力的新見解：聖經文學中的相當大一部分內容，是否是在兩個方向的文學和思想共同影響的匯流之下而形成的？這將對理解聖經的起源和古猶太教的產生帶來深遠的影響。與會的大部分學者對此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大會的會程分為兩大部分：上午是會議的“主要論文”（Main Papers）即重要的主旨報告，共15篇；而下午則是數十個平行展開的分會場同時進行，與會學者各自參加。顯然，這15篇主要論文便具有管窺如今國際舊約研究前沿進展的“風向標”意義。這些主旨報告的題目、方法和視角之廣泛，令人稱奇。其中包括兩篇傳統德語舊約神學中的五經批判性研究，三四篇利用考古發現、圖像及銘文等新資料的歷史學研究，一些從特定詮釋學角度出發的釋經性報告，以及分別由黑人、女性主義和亞裔學者帶來的三場聖經解讀的演講。一方面這表明了當代舊約研究日益增長的開放性和多樣性——無論採語文學、歷史學、考古學與圖像學還是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方案，都能在該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隱含了一個“去中心化”的風險：如何能夠說服關心“原始申命記”（Ur-Deuteronomium）的文本重構的學者，和關心當代非裔聖經接受和政治抗爭事業的學者互相理解對方的研究——更遑論欣賞與積極對話？這很可能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在更大意義上而言，這也反映了當前以歷史-語文學為導向、“文本-歷史中心主義”為主的歐洲與以色列聖經學術界，與偏好文學-詮釋

學、“讀者一處境中心主義”的北美英語聖經學術界之間長久以來的緊張關係，以及新舊範式交替之際存在的代際和方法論上的張力。

表1：大會15篇主旨報告主講人及題目

主席報告	Bernd Schipper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埃及世俗體紙草文書與希伯來聖經：朝向關於埃及與聖經的新範式
1	Sonja Ammann (瑞士巴塞爾大學)	被分擔的痛苦：聖經的巴比倫征服記載中的集體暴力與記憶
2	Jan Christian Gertz (德國海德堡大學)	亞伯拉罕是如何去到希伯倫的：論舊約文本定年的困難問題（德語）
3	Katharina Pyschny (奧地利格拉茨大學)	視覺形式中的文化混雜性：波斯和早期希臘化時代南黎凡特的圖像傳統
4	Yuval Gadot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近期耶路撒冷發掘對聖經歷史編纂的貢獻
5	Kenneth Ngwa (美國加勒特－福音神學院)	米利暗與古實女人：非裔聖經詮釋學與探尋解放後的解放
6	Monica Jyotsna Melanchthon (澳大利亞墨爾本神學院)	達利特女性詮釋學與聖經解釋
7	Frédérique Michèle Rey (法國洛林大學)	測量文本傳統間的差異程度
8	Molly Zahn (美國耶魯大學)	作為祭司思想之繼承的《聖殿古卷》
9	Maggie Low (新加坡三一神學院)	以賽亞在亞洲
10	Katherine Southwood (英國牛津大學)	身體想像能幫助我們克服面對約伯時的認識論不公嗎？
11	Ed Greenstein (以色列巴伊蘭大學)	我們該如何理解路德的故事？
12	Reinhard Müller (德國哥廷根大學)	原始申命記及其歷史位置（德語）
13	Jorge Blunda (西班牙科爾多瓦天主教大學)	作為以色列和猶大“記憶之場”的禱告：再思可拉後裔的詩歌
14	Anne Katrine de Hemmer-Gudme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我開門迎接行路的人”（伯 31:32）：希伯來聖經中好客的社會語法與敘事功能
15	Jan Dušek (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	北黎凡特去神聖化的土地與政治

由於IOSOT的一貫規定，每位學者一生只能在大會上發表一次主旨論文，旨在避免資深學者長期“霸佔”主席台^①，從而為中青年學者，尤其是新近獲得教授席位的研究者，提供展示其學術成果的舞台。本屆大會安排在今日首場發言的巴塞爾大學教授索尼婭·安曼（Sonja Ammann）正是這批新生代中的代表人物。她於2014年在哥廷根大學師從克拉茨（Reinhard Kratz）獲得博士學位，2017年在柏林洪堡大學完成教授資格論文，同年獲聘為巴塞爾舊約講席教授。過去五年，她主持的瑞士國家科學基金（SNF）項目“希伯來聖經中集體暴力記憶的轉化”，以敏銳的問題意識和跨學科方法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該研究延續了“記憶研究”與“創傷研究”的理論脈絡，將《希伯來聖經》視為在帝國壓迫、流亡與毀滅創傷中誕生的文本見證，從而引入大屠殺記憶及戰後德國人與猶太人的記憶書寫與身份建構等當代問題意識參與對話，在堅守歷史批評的基礎上拓展出古今共振的詮釋空間。可以預見，以安曼為代表的新一代學者將繼續在未來的學術領域發出聲音，為聖經研究與更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對話開闢新的路徑。

與五個上午的“主要論文”相對，五個下午則安排給了平行展開

^① 出席本屆大會並宣讀論文的部分資深學者包括：圖賓根大學榮休教授、當代五經研究的泰門布魯姆（Erhard Blum, 1944-）；原牛津大學欽定希伯來文教授，治以賽亞書的大家威廉姆森（Hugh G.M. Williamson, 1947-）；慕尼黑大學榮休教授，在五經、大先知書和舊約神學領域著述宏富的列文（Christoph Levin, 1950-）；烏特勒支大學榮休教授，治古以色列史、大先知書與第二聖殿文獻的貝京（Bob Becking, 1951-）；明尼蘇達大學猶太研究、宗教學與法學三聘教授，治《申命記》與古代比較法律史的列文森（Bernard Levinson, 1952-）；海德堡大學講席教授，治舊約神學與釋經學的俄明（Manfred Oeming, 1955-）；法蘭西學院院長兼“聖經環境”講席教授，著作等身的羅默（Thomas Römer, 1955-）；哥廷根大學講席教授、當代“哥廷根學派”的領導者克拉茨（Reinhard Kratz, 1957-）；明斯特大學講席教授，治五經、聖經法律與波斯時代猶太教的阿亨巴赫（Reinhard Achenbach, 1957-）；羅馬宗座聖經學院院長，治古以色列史、銘文學與亞述學的杜波夫斯基（Peter Dubovský, 1965-）；牛津大學Oriell and Laing聖書解釋學講席教授，當前引領死海古卷、第二聖殿晚期猶太教及希臘化猶太文獻研究的欣迪·納曼（Hindy Najman, 1968-）；等等。

的諸多分會場，其中又分為兩部分即“常設單元”和“主題單元”，前者以相對固定和周正的文本和問題域為單位，包括五經、前先知書、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十二小先知書、智慧文學、詩篇、歷代志和以斯拉-尼希米記、古以色列與古代近東宗教、古代近東中的古以色列史、次正典與相關文獻、死海古卷、接受史，以及神學、倫理學與詮釋學共15個單元，各有2場至7場會議不等（每場宣讀2-4篇論文，通常為3篇）。其中規模最大的，無疑仍是舊約研究傳統上“皇冠上的兩大明珠”——五經和大先知書。在五經研究方面，三年前的蘇黎世會議上，彼時的主席康拉德·施密特（Konrad Schmid）教授在其主席報告中提出，當代五經研究應打破傳統上過分關注《創世記》並試圖僅僅從分析《創世記》出發形成一個編修模型便隨即將它生套地應用在整個五經上的誤區；相反，應當更加重視五經中法律材料與敘事材料的結合，以及《利未記》《民數記》等書卷在編修上自成一體的獨特性——這一號召在三年後的本次會議上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體現。相當多文章來自對曠野敘事和聖潔法典的這兩個五經研究中的近期熱點的討論。^①在大先知書方面，雖然常設單元的論文整體上略顯平淡，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主題單元”中特闢了“以西結書與祭司文獻”的分會場並吸納了多篇較重要的報告，顯示出這一學術史上的經典問題的持久重要性。

“主題單元”的內容則更為豐富浩瀚，共有26個分會場，其主題和大致學科分佈（由筆者概括）如下表所示。限於篇幅，顯然難以對所有這些單元的研究進展逐一進行概括並評析其價值。然而，仍有以下兩點初步的觀察與思考可以在此簡要地提出：

^① 參見：Christophe Nihan, *From Priestly Torah to Pentateuch: A Study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ook of Leviticus*. FAT II 2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7; Julia Rhyder, *Centralizing the Cult: The Holiness Legislation in Leviticus 17–26*. FAT 134.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9; Jaeyoung Jeon, *From the Reed Sea to Kadesh: A Redactional and 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Pentateuchal Wilderness Narrative*. FAT 159.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22.

表2：26個分會場的主題及其大致學科分佈（由筆者概括）

學科分佈	主題
舊約語文學	文學批評的文獻基礎
	理論化聖經文學的傳播與文本性
	書寫文化與希伯來聖經
	對希伯來聖經形成的抄卷進路的視角與前瞻
	第五版希伯來聖經（BHQ）工程
	西北閃米特諸語的語文學和語言學差異
先知書與智慧文學	撒母耳記中的地理與編修
	在外邦政治與文士神學之間：列國神諭
	以西結書與五經中的祭司文獻
	撰寫詩篇注疏
	韌性：詩體文學中的祈禱文本
舊約神學	權力的再現與理想化
	兄弟與陌生人：古代世界中的身份協商
	希伯來聖經中的同理心與身體想像
	舊約人類學
古以色列宗教史	紀念碑性與希伯來聖經
	神話與神話制造
	神秘與出神
	古代世界中的天啟末日論思考
考古和銘文學	勞動作為波斯帝國在南黎凡特的研究新進路
	波斯時代東地中海的考古與銘文狀況
	世俗體埃及紙草文獻與希伯來聖經的形成
	波斯與希臘化時代的以色列和埃及
方法論與學術史	數字人文與聖經研究的電子進路
	博舍維茨論威爾豪森：跨學科新書研討
	雅各布·沃勒對希伯來聖經的貢獻 ^①

^① 這一紀念專場旨在致敬在今年5月突然因心臟病意外辭世的圖賓根大學舊約講席教授、還未年滿五十歲的雅各布·沃勒（Jakob Wöhrle, 1975-2025）。沃勒以對《十二小先知書》的開創性研究取得了廣泛的學術聲譽，在近年來與特拉維夫大學考古研究院的領導者利普施茨（Oded Lipschits）廣泛合作，促成了“考古與聖經”的系列國際網絡課程，亦與布拉格查理大學團隊合作，正在進行“聖經的以色列的種種概念”（The Concepts of Biblical Israel）的德國國家科學基金委（DFG）重大項目，其學術事業在知天命之年正在厚積薄發，卻猝然離世，誠然令人惋惜。

第一，舊約文獻學與文獻史，特別是聖經形成研究仍是當前學界着力甚深的一個重點。^① 晚近以來，伴隨着死海古卷的發現，以及大量來自王國和第二聖殿時期的銘文、紙草以及近東文獻的整理出版，對聖經的編修、結集過程的文獻史研究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過去對五經、申命歷史及先知書的編修研究往往只是基於對文本的“紙上”分析，那麼當代的此類研究就必須將“紙”本身（即文本的物質載體）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納入考量。例如，由於每次修訂（redaction）在理論上都需要一卷新的羊皮卷將其重新謄寫出來以確立修訂後的文本，而羊皮卷顯然造價極為昂貴且工藝複雜、產量有限，因此難以支持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對文本發生了密集的多輪修訂的假設；又如，羊皮卷自身的物理特性是易於靈活地裁切和重新粘合拼接，但卻不適於密集地在原有文本之上進行塗改式的刪削，因此，更應考慮成塊的文本單元出現在特定文本位置是由於這種剪切粘貼的修訂結果；等等。這即是如今由美國學者大衛·卡爾（David Carr）開拓的“抄卷進路”（Scroll Approach）的要義；而圍繞着文本的物質製作、生產、傳播，書寫的社會和經濟基礎（如：文士如何培養？在哪裏？他們靠甚麼生活？），如何處理不同文本承傳系統間的異文等等問題，也是在多個相關會場引起廣泛討論的話題。

第二，考古和銘文學，特別是涉及到波斯和希臘化時代南黎凡特（巴勒斯坦地）的社會、經濟、政治支配與文化交融的資料，以及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和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行政、司法和文學文本，日益得到廣泛的注意並不斷湧現出重要的新材料，成為刺激舊約研究的一大生長點。隨着文本研究日益傾向於將波斯時代定位為《希伯來聖經》文本形成的關鍵時期，但偏偏阿契美尼德帝國並未像亞述巴比倫一樣留下完整

^① 在這方面進行綜合性總結與介紹的較新力作，是【瑞】康拉德·施密特、【德】揚斯·施洛特合著的《聖經的形成：從最初的文本到神聖的經書》（*Die Entstehung der Bibel: Von den ersten Texten zu den heiligen Schriften*），中譯本將由香港道風書社出版。

的王室編年史以及豐富的文學、學術和宗教文本，資料相當缺乏，學者尚需借助希羅多德等希臘作家的記錄才能拼湊出完整的波斯帝國歷史。因此，在這方面的新材料和新解讀的意義毋庸置疑。

例如，來自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跨學科團隊“WORK-IT”正在進行的對波斯時代南黎凡特的政治經濟支配狀況的研究，就綜合了伊朗學、銘文學、考古和聖經文本（以斯拉—尼希米）等不同方向的視角，可以預見項目最終的成果將提供重要的見解。又如，來自海法大學的以色列學者巴爾尼亞（Gad Barnea）發表的一篇論文，聚焦於象島（Elephantine）重要文獻《致哈拿尼雅的信》（TAD A4.7）中哈拿尼雅的身份，提出了其系波斯帝國的埃及副總督的大膽主張。再如，意大利青年學者達米柯（David D’Amico）在其對《馬加比一書》的研究中發現了文本所描述的哈斯蒙尼德王朝的（理想化的）政治組織結構，與同時代羅馬政體之間存在着廣泛的平行關係，反映出希臘化晚期的猶太社群甚至已對遙遠的羅馬共和國有所了解。這些都是令人耳目一新、有潛力進一步拓寬學術邊界的精彩研究。

最後應當提及的是亞洲學者的參與。本次到場的亞洲學者僅有十餘位，其中包括在大會第三天代表亞裔/亞洲詮釋學進路作主旨報告的新加坡學者瑪吉·洛（Maggie Low），以及年高德劭，在烏加里特研究和閃米特語言學領域堪稱泰斗的津村俊夫（David Tsumura, 1944-），與來自韓國的三四位學者。整體而言，無論從論文入選學者的數量，還是從整體報告發表的份量上來說，亞洲學者的參與程度和研究深度，與聖經在當代亞洲廣泛的閱讀與接受相比，都仍然是極不相稱的。然而，無論是古希伯來與古代近東文明的豐富與浩瀚，還是現代聖經學術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對於漢語學界、教界和讀書界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我們認為，中國學者不應只是國際學界亦步亦趨的學舌者和追趕者，而應當認識到在參與國際聖經研究中的獨特優勢：

其一，隨着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召開和“文明互鑒”倡議的提出，中國學術正在世界比較文明史與全球古典（Global Antiquity）領域日

益獲得廣泛的影響力；而與希臘羅馬古典文明和歐美現代工業文明相比，我們對以《希伯來聖經》為重要載體和紐帶的古希伯來與古代近東文明的學術積累仍是相當不足的。以文明對話、兼收並蓄的眼光，主動參與國際學術的前沿探討，通過跨文化比較的方法和語境詮釋學的思路^①，亦必將為當前的聖經研究引入新興的對話伙伴、注入新鮮的問題意識。

其二，更具體地說，古代中國和古希伯來文明都最早發展出了發達的文本文化、經學傳承和古文獻學術，當前舊約學界熱烈討論的若干重要問題，如文本的版本校勘和輯佚，抄本間的傳承史關係，“聖經內部注解”（比較先秦文本中古注“竄入正文”的現象），以及對經典進行時代化更新的“重寫聖經”現象^②都可以在中國文明的浩瀚傳統中找到豐富的跨文化類比和呼應。相比之下，現代西方的古文獻學術至今不過經歷了數個世紀的發展；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實際上可能擁有豐富的經驗和敏銳的判斷力，從而擁有為打通當前學術疑難中的“孔竅”提供思路的潛力——這亦是我們不可忽視、也應當有自信的地方。

但這一切可能性，都還需要我們首先充分吸納國際學界深厚的已有積累和學術理路，並自覺和規範地參與到國際學術的前沿討論中去。我們亦希望在不遠的未來，隨着漢語聖經學的翻譯、教學和人才培養等方面久久為功的努力，能夠看到更多的華人學者在IOSOT這樣的頂級學術平台發出自己的聲音，使東方真正成為國際學術版圖中的重要“一極”。

^① 可參見游斌、高喆：《比較經學是漢語神學的應有之義：神學論題引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2期（2015年），17-24頁 [YOU Bin and GAO Zhe, "Comparative Biblical Studies as the Proper Task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a Theological Topic,"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 42 (2015): 17-24.]; JIANG Zhenshuai (姜振帥),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cepts of Torah in the Hebrew Bible and Li in Zuozhua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45, no. 3-4 (2019): 175-89.

^② 參見強文玥：《“重寫聖經”與“經文化”：早期希伯來經文的生成與活性》，《哲學研究》2025年第2期，131-146頁。[QIANG Wenyue, "Rewritten Bible and Scripturalization: The Formation and Vitality of Early Hebrew Scriptur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 2 (2025): 131-146.]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Sمند, Rudolf. "Fifty Ye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Vetus Testamentum." *Vetus Testamentum* 50, no.1 (2000): 14-26.

JIANG Zhenshuai.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cepts of Torah in the Hebrew Bible and Li in Zuozhua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45, no. 3-4 (2019): 175-89.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游斌、高喆：《比較經學是漢語神學的應有之義：神學論題引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2期（2015年），17-24頁。[YOU Bin and GAO Zhe. "Comparative Biblical Studies as the Proper Task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a Theological Topic."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 42 (2015): 17-24.]

強文玥：《“重寫聖經”與“經文化”：早期希伯來經文的生成與活性》，《哲學研究》2025年第2期，131-146頁。[QIANG Wenyue. "Rewritten Bible and Scripturalization: The Formation and Vitality of Early Hebrew Scriptur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no. 2 (2025): 131-146.]